

香港的性政治

吳敏倫

很榮幸作為這個會議的第一位講者。我想，作為第一位講者，不是因為我的歷史或者性政治經驗比各位多，也不一定是說我的性政治故事比其他人更加轟轟烈烈。我看其他講者的生涯比我更驚濤駭浪，我不一定是在性政治裡面受到最大攻擊的一個。所以我想，放在第一位，或許是因為我最年長吧，這也是一個榮譽。

我在香港做性教育、性學，有數十年，我希望能以這些經驗和大家交流可怎麼應付性政治的攻擊，想出一些辦法，給後來者參考怎樣預備、武裝、保全自己，然後能夠在性學方面做更多的事。

先講講我的看法，什麼是「政治」。

什麼是性政治？

我認為政治是人民團體在與大家有關的事情上做出決定的過程。它關心的不只是個人，而

是整個團體的福祉。但是如果團體很大，譬如社會或國家、民族，其中便會因為有不同的種族、地域、信仰、性別、生活取向等特點而形成很多小團體，小團體因為其特點而各有不同的需要，也為各自的需求爭取利益，於是形成互相競爭和衝突的局面。「政治」便是在各團體之間做衝突管理、調和與決定。

比如說一個社會和國家要作決定的時候，它應該給哪個團體比較多的權力／利？或者政策應該對他們給多少支持或是不支持？如果支持A就不能夠支持B，這些小團體就要爭取他們的權力／利，爭取的時候就有衝突了。團體間有不同的需要，在上面做政治的人就要管理，即所謂「衝突管理」。

怎麼樣可以作一個好的決定呢？每一個小團體都可以得到它們要的吗？最理想當然是通贏，可是很難，最壞的就是通輸，比較差的是有些人贏、有些人輸，但最常見可行的則是每個團體都各讓一步，贏一些重要的、輸一些較不重要的，即是妥協。而妥協到什麼地步，也是需要一個管理的過程來決定。

但是為了什麼而衝突呢？那就是利益。利益有些很重要、有些不重要。政治的衝突內容亦可以很多，可大可小，但最大最終的衝突無非都是關乎權力、資源、及生死存亡的事。當然，人們不會因為沒有利益和權力就真的死了，不過生不如死也差不多，你有權力，我沒有權利，那就生不如死了，因為當資源太少的話，便失去能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

性政治也是一樣，個別團體的性權力、性資源、及性生活模式存廢的爭取是最終目的，所以，為什麼性政治是危險的？是因為我們爭取的東西是很重要的、關乎生死存亡或生不如死的事，所以這方面的爭取有時也很激烈。

政治的爭取手段亦不外乎一些幾乎已經被標準化了的權威建立方法。Wabcr (1947) 將這些不同的政治手段分類為：

1. 務實權威：例如用資源、權力、名利來獎勵，或者用暴力來威脅人身或心理，或者用「專家」的說法來實行威脅、危險警告、處罰、銷毀行動等等。

2. 魅力權威：例如利用吸引、欺騙、或超自然力量來把某人某事神秘化，亦可用廣告、宣傳、重複灌輸等等手段。

3. 傳統權威：例如用規範化、教化、污辱、妖魔化、邊緣化等等。

4. 理性權威：例如用說理、教育、普及化、刑事定罪、合法化、系統化等等方法。

在「性」方面內用的政治手段包裝不同，但是實質上還是差不多的，這兩天會議裡大家應該還會聽到很多其他的性政治手段。

以下我會描述個人在香港做性學的經歷，讓大家一起看香港的性政治形勢與活動發展，以及一個香港性學家所可以遇到的困難。為使描述簡易流暢，我只會把各種政治手段粗略地分類排列，不會根據上面那嚴謹的學術分類法。

我的性政治啟蒙

首先，我原本是不喜歡政治的。我從來沒想過要做性政治，甚至沒想過要做性方面的東西，對任何政治和性別鬥爭也沒興趣，因為我覺得政治是很奸險、很勾心鬥角的，沒有意思。

我是讀醫科的，但並非一開始便立志於性學。醫科畢業時選擇精神醫學，只因為當時香港的精神科還不發達，這門的醫生極為不足，我看到很多精神病人得不到應有的照料，而我個人興趣廣泛，尤其喜歡比較抽象的東西，應該比較適合做精神科，所以便進入了。入了精神科後，發現精神科在心理治療方面的服務更弱，便在往英國深造時集中接受心理治療訓練，填補真空。心理治療當然離不開佛洛伊德的理論，他同時也是性學家，所以，他的理論離不開性，而當時（一九七〇年代）Masters and Johnson 的性治療、男女的性反應研究也正如日東昇，所以我的學習也不能不學性，才發覺人類性觀念與性生活千瘡百孔，必須有多些人去有點事。

我發現影響人的心理和精神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性」，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性是什麼東西，因為沒有學過，還有很多錯誤的想法和行為，他們不知道怎麼處理。那個時候我才發現，性是人生、心理上的一個很大的漏洞，還沒有人填補，所以我覺得我要多做一點性學上的東西和研究，因為性影響人的精神、心理健康是很大的。

我的性學導師當然鼓勵我，但他也嚴肅地提醒我，必須有足夠心理準備，能有效地應付凶

險複雜的性政治，否則若非出師未捷身先死，便也只會不知不覺做回個反性的人。他囑我多閱讀一些性學前輩的歷史，從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來汲取教訓。我對性政治的啟蒙便是從這些閱讀和導師的傳授而來。

但從閱讀和傳授得來的畢竟是間接知識，我當時對性政治的看法仍很天真，覺得前輩的遭遇已是在過去的時代，現在民智已開，一個人只須本著一份濟世之心、堅守知識真理、不求真利、不傷害他人，總不會錯到那裡。而若前輩能獨善其身，只做份內工作，政治又與他何干？我那時給自己的定位很簡單：做一個在研究、臨床與教育上平衡兼顧的性學者，不涉政治，更不做「性學烈士」，如果人家反對得很厲害，我就不做，就做本分的醫生吧！再者，如果我只在中國人文化，不在我不懂的文化裡做事，我們文化裡的人應該會支持我，我應該更可以應付。比如說，我若做的教的都是中國人最接受和最需要的，那麼他們一定不會反對我，而且我只要保持理性和感性上的平衡，應該沒事了吧。

無人能脫離政治而生存

當然，這樣天真的性學定位不可能維持多久。

我一九七五年從英國回港後，第一份比較重要的工作就是帶領香港大學醫學會舉行一個公開的性與健康展覽，從而探討本地性教育和性健康服務不足的原因。我們對來參加的人提出一

些簡單的問題，問他們覺得香港的性教育做得怎麼樣，足不足夠。當然他們覺得不足夠。問他們為什麼不足夠呢？發現竟然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士認為是由於社會不重視，因為不重視，所以師資不足（百分之三十四）。另外還包括三分之一的家長反對，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家長要反對性教育呢？我們教育他的兒女有什麼不好？其他的教育，他們完全不反對，為什麼反對性教育呢？當然他們有很多不成理由的理由。但是社會不重視，可能是因為資源有限，在發展期中，分配當然有輕重緩急之分，但關乎族類繁衍與精神健康的性，和溫飽或人身安全同樣重要，因為資源不足而做得不夠猶可說，但若因社會不重視或家長反對而不做性教育，那就大有問題。

我發覺我必須先要理解那些反對和不重視「性」的原因，方能清除這些阻礙，爭取社會的支持，有真正的服務對象。如果社會不重視，我開一個「性診所」或者提供一個「性教育課程」，也不會有人來找我，那麼我做這些東西就沒有用、接觸不到他們的性了。所以我一定要做「公共的」性教育，讓他們明白這些事情很重要，來接受我的服務。我不能只做一個醫生，掛個「性健康服務」、「性診所」的牌子，以為他們就會來；如果要他們來，就要先告訴整個世界和社會這些性的問題是可以教、可以醫得好的，性教育是要學的。但這樣把性教育事情「公共化」，我就不能不碰到性政治了。

我的「公共」性教育，從教醫學生開始。在醫學院裡面教醫學生性教育，教他們做醫生要

照顧病人的性問題，這個可以了吧？他們會接受了吧？不過，每次在醫學系開性課程，開完之後我都用問卷問學生覺得這個課程有用嗎？對將來做醫生有用嗎？卻有大概一半學生說沒用，覺得為什麼不教其他的東西，浪費他們的時間？他們說：「我做醫生，不是做性的……，我是做外科的，學這些同性戀、什麼戀，和我有什麼關係？這些不是病人，我又不會看這些人。」

好吧，沒關係。我想，也許我做多幾年，他們會慢慢覺得有用，會接納我。但是問題沒那麼簡單。

當時教性學，沒有 power point，是用國外來的錄音、錄像檔，播出來給學生看，有些學生覺得這些錄像帶是淫色刊物，他們不要看，有些學生真的看不到一兩分鐘，就走出去了，不是因為他們看不慣或看不懂，而是覺得不應該看。走也沒關係，還有半班學生剩下，我還是可以教吧？可是你不找性政治、性政治已找上門來……

不合作政治

第一種找上門來的性政治是「不合作政治」。它不一定是外來的，而更多是自己工作環境內的，也不一定來自你的上司，更多會是來自你的同事、「合作」單位、甚至下屬。下面是我的一些例子。

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有錄影帶，但是錄影帶格式還未統一，把教學影帶轉換格式是一件我們

經常要做但費用高昂的工作。上課時要用的那些錄影帶因為來自國外，播放的格式和香港常用的格式不一樣，總是要先轉換格式才能播放。但是轉換格式的價錢又很貴，系所無法承擔，所以香港大學有一個教研媒介支援中心，負責整個大學的錄像帶轉換工作，好節省人力物力。一九九一年，我送了一卷由外國性學研究機構製作的有關女性性反應實驗的詳細記錄錄影帶給該中心轉換制式，結果得到這樣的回覆：「因為來件的內容問題，本單位人員恕不能為你送來的電影轉換為 VHS 制式。」

我就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內容有什麼問題啊？他們也沒說是什麼問題，反正不轉換就不轉換。我就打電話給那個主管，他說「我也沒有辦法」，因為員工好像是信某個宗教的，覺得這個錄影帶就是淫色的。我說這哪是淫色啊，這是美國性學研究中心實驗室整個研究過程的錄影，很有教育意義的。我說如果他們是信什麼教，那不一定只有性的錄像帶不能轉換吧？比如說我有一個〈達爾文理論〉進化論的錄影帶，他們是不是也可以因為信的教而拒絕？那豈非什麼東西都可以拒絕了？我不知道單位裡有什麼人員信什麼教的，為什麼單單是性的影帶不可以轉換，其他都可以？很多也可能和他們信的東西有衝突啊！主管說沒辦法，如果強迫轉換影帶，工作人員都辭職的話，那整個教媒中心都不能運作了。我就一直投訴，向上層逐級投訴至校長室，卻仍然無能為力，沒法逼迫該中心替我的影帶轉制。結果此後有一段時期，我只能用我有限的教研經費資金，昂貴地找外面公司替我的性影帶轉換。我的教研經費不多，本來是要

用來做其他事的，但也只好拿去轉換影帶了。全香港大學需要這樣做的教授就僅我一人！這就是不合作的政治。

二〇〇四年香港大學還發生了一些事，不是高層管理人有問題，而是下層人員有問題。我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作，詳細策劃聯合推出公開的專業教育和性治療課程，倚重網上學習，方便全部都是任職的學員使用。網上學習最需要網上能提供有系統的參考資料，那時德國性學家黑伯爾教授造了一個很權威的性學網，我當然要用他的網作為學生的主要參考工具。為了方便學生使用，我取得黑伯爾同意，讓我的教學網不但可以與他的網連結，還可自由轉載它的內容。我將安排通知負責做這連結／轉載的專業進修學院電腦部，得到的回覆是：「因來件版權（內容）問題，本學院網頁恕不能轉載你傳來的網站內容或與它的網站連結。」

我大惑不解，我與創始人黑伯爾很熟，已弄清了版權（內容），也出示了他的同意書，但電腦部仍諸多推搪，說憂慮版權的這個那個，即使我指出與黑伯爾早已合作十多年，若有任何版權問題我願負全責等等，他們仍無動於衷，總之就是不做。我和他們交涉了三年，課程都教完了，直至我退休，黑伯爾這個網仍是上不了香港大學的網，真正的原因是甚麼，不言而喻。

二〇〇六年，香港大學的另外一個單位，就是大學學生就業輔導處，負責聯絡全香港打算招請員工的機構，替他們在校內向快將畢業的學生招手，主辦就業講座，在該處的專用網頁刊登招聘廣告，告訴學生有哪些公司要請人，招聘公司的名單，要招什麼樣的人，公司性質是什

麼等等。有了這些資訊提供給學生，學生知道後便可以前去申請，畢業之後就可以上工。那一年，一間我熟識的、在香港設廠已廿多年的性用具出產公司向我投訴，他們向就業輔導處要求登出招聘廣告及連結其公司網頁給學生參考，結果說不能刊登，得到以下回覆：「因貴公司網頁內容問題，恕本處不能將貴公司的招募員工廣告在本處網頁登出：」

這個性用具公司很大，需要很多工程師和電腦人員，因為現在的性用品都是很高檔的，是電動的、電腦控制等等，這些工程師的前途發展是無量的。但是，只因為公司製造性用品，所以就不准刊登，說對學生的影響不好。可是真正不好的影響，是學校不讓他們申請這個行業。我就此事多次與輔導處交涉，也讓學生知道，擾攘一番，輔導處方才讓步，但還是要求該公司網頁改版，「收斂」一下「色情」內容才可通過。其實也沒有什麼色情的東西，就是假陰莖、假陰道等等而已，這些快畢業的學生也都是成年人了，為什麼不可以看這些東西？

不合作政治常常是來自自己的單位，還是這樣無稽的不合作，氣死人。

污蔑政治

不合作算是消極的抵制，但是性政治往往以非常積極的污蔑來進行。

一九八五年我成立香港性教育會，公開教性教育，而且與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合作，推出多個新的公開性教育課程和活動，內容比較全面、坦白和開放，立即遭一些保守的宗教人士政

擊。有一個具有這類宗教背景的教育系講師便在報章投書說：「家計會的性教育只教性方法，忽視倫理價值觀念，助長濫交：」，公開說我們教的東西不好。攻擊者其實不是沒有教育程度的人，也是大學的教授，但是他們可能全然沒有看過我們教的內容才會這樣講，總是要讓我們這些教性教育的人工作不下去。

污蔑的投書有些是放在報章上面，但是報章效果不一定強烈，所以有些人就投書到我個人的工作單位或專業學會。一九九四年，香港人的婚姻飽受已婚男人北上「包二奶」（養小老婆）的衝擊，大眾紛紛議論有何根治良策。我指出現有的一夫一妻終身婚制違反人性、不合時宜，提議改良至容許任何男女數目組合的多元化婚制，卻被說成是鼓吹包二奶合法化，引來大眾圍攻。有某醫生寫公開信給香港醫學會，說：「吳敏倫醫生（對婚制度的言論）：只會是大眾八卦飯局上的笑話：應受納稅人譴責……。」

一九九九年，我在香港一個專門處理家庭暴力問題的機構「和諧之家」做義務董事，這是一個政府支持的ZOO。有一個補習老師被控涉嫌性侵犯女學生，他的律師請我做辯方專家証人，我綜合各方面的證據和看過他與該女童的作供錄影後，得出結論是該女童編造故事。法官也接納我的分析，被告立即無罪釋放。事件曝光後，我被一群「愛護兒童」、「反對性暴力」等機構和人士圍攻，其中也有「和諧之家」的成員，他們寫聯署信，對於「吳敏倫三番四次捍衛性暴力的言論」忍無可忍，要求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向受到我言論傷害的婦女和兒童

道歉，並且檢討自己還有沒有資格繼續做和諧之家董事之職位。

二〇〇五年，我鑒於香港兒童已越來越早熟，向政府提議把合法性交年齡從十六歲降為十四歲，結果有市民來信謾罵反對，說「社會是要有秩序的，故此要立法規範人某些行為」，「家庭亦要有秩序不能亂倫」。這封信很有趣的是，他還抄送副本給港大醫學院的院長，倒不是說要院長開除我，但是要院長「作評理」，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

其實，上面那些收信的人，並不會把我怎樣，也不會解雇我，頂多要我解釋一下，文書來往一番了事，但只是令我覺得很麻煩而已。

示威政治

若嫌文字力度不夠，性政治還可發起群眾運動，性保守人士特別偏好這一招。一九九五年，政府做色情刊物法律諮詢時，性保守人士便做了一次大的集會以補救他們在說理上的不足。在香港，不時會有公開的反色情集會，他們倒不是直接針對我，而是針對我做的性教育，但是有些時候我講的東西太厲害了，一九九九年那個兒童謊報性侵的案件時，那些寫聯署信要求罷免我職位的「愛護兒童」、「反對性暴力」人士也向我攔路示威，扯我衣衫，高舉描寫我人面獸心的漫畫，封我為「性暴力博士」，說我殘害童真，還頒給我一個牌，上面寫著「長期為禍獎」，我就接受下來，說謝謝謝謝。這個獎我還放在家裡，我覺得不是侮辱，而是個很大的榮



長期為禍獎
(圖片來源／吳敏倫)

譽。

二〇〇八年，香港性教育會主辦香港性文化節，性文化節其實是從大陸開始的，我覺得做得很好，所以我在香港也辦了，有很多不同的單位參與，提供公共的性教育，向大眾說明自己的單位做些什麼性的健康服務，有什麼提供，給一些

性資訊呀，發一些免費的性刊物等等，有幾十個單位參與。有一屆，我們也加進了人體寫生示範環節，以倡導性藝術、性美學，這件事情就被保守人士視為洪水猛獸，向警方投訴之餘，還在性文化節開幕時遣派大隊踢場，大做「貞潔遊行」，製造劍拔弩張的緊張場面。他們大喊口號說：「我們要貞潔，不要學這些不良的性教育」，還有香港的主教也走出來說「你們不要學這些東西啊！我們要保持美德！」在當天同樣發出聲明，在同一個場地辦活動打對台，就是要破壞性文化節，警方不得不嚴陣以待。一個本來輕輕鬆鬆，寓教育、文化於娛樂的嘉年華會就在混亂和慘淡氣氛下收場。

婦女政治

宗教人士是反對性教育的一群人，另外一群也反對性教育的就是婦女。其實不是全部的婦

女，是有一些婦女學了奇奇怪怪的婦女主義極端理論，覺得性學、性教育是對婦女有害的，是為男人說話、爭取男人權益的。而很多反性的宗教人士要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就拉攏已經有政治本錢的婦女「同路人」，套用她們的方法和理論，拉她們下水。在性政治方面，婦女是最好利用的一群，因為她們在爭取女權的道路上已經很有成績，方法和理論也很成熟有效，於是，反性者就把性開放說成是危害婦女的，多元婚制是剝削婦女，威而剛和性治療增加婦女性虐待，人體寫生是把婦女的身體分割，選美或以美女做商品廣告便是將婦女物化、歧視、漠視：

舉一個例子來說我和婦女們的辯論。一九九七年香港無線電話開始的時候，電話公司想要鼓勵民眾上他們的電話網，所以就賣了一個廣告，廣告上有個年輕女性坐著，鏡頭只拍到座位的這部分，然後三個大字「任你上」。有些婦女看到這廣告就說這個廣告是歧視、性騷擾婦女的，她們說這個廣告上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只有中間這個部位，沒有看到她的頭，沒有看她的腳，所以分割了女人，顯示這個女人沒有自主權，而且廣告詞也是粗言穢語。她們那個時候對這個廣告反對的很厲害，還舉辦遊行，也到處投書，寫文章罵，最後這個電話網的公司就將這個廣告撤掉了，然後也道歉，說「對不起，真的做錯了」。但是，我覺得這個公司是很冤枉的，我覺得這個廣告沒有性騷擾婦女，也不是歧視，我寫了很多文章，我舉例說，如果我們拍一個同樣姿勢的廣告，用一位男性廚師做主角，端著兩道菜，廣告詞說「任你吃」，那你會說這個

廣告性騷擾了男人嗎？會不會說這個廣告將男人視為工具，呈現了一個不完整的男人，因此這個廚師沒有自主權？所以說，同樣一個類型的廣告，你不會說它騷擾誰，但為什麼用女性的形象就會騷擾到？結果因為這篇文章，婦女就把我視為大敵人。

從這些婦女政治理論，也衍生了「性學霸權」及「性學性別主義論」的說法，把性學與婦女對立，成為她們的敵人。這些極端的婦解分子在很多地方刊登她們的理論，也在報紙上罵戰，說我歧視婦女、分割婦女、性騷擾婦女等等，她們也在我身上指控很模糊不清的罪名。我就寫文章駁斥這些理論，一直沒有停過，其中一個罵我的就是素黑，是香港很不錯的女性作家，但是十年前、八年前她還是罵我的。她現在好多了，似乎，我和她辯論之後，她比較進步開放了，所以她現在寫的東西好很多，但是之前是罵過我的。我很慶幸，有很多婦女分子與我辯論一番後，真能醒覺是中了反性者的奸計，她們迷途知返後，不但成了我的粉絲，有些還做了我性教育會的骨幹，所以和她們辯論也有好處。

傳媒政治

傳媒是影響力很大的政治工具，所以一定要小心他們怎麼利用你，或者怎麼將你的信息呈現出來。傳媒有個問題，就是它的生態必須反映問題和報導社會衝突，有些傳媒為了生存，難免做過火，把問題和衝突誇大以求銷路，不知不覺便做了性政治工具，未必真的在性方面有甚



港大教授吳敏倫為一宗小童非禮案同近期幾宗「單行」，被八個婦女做「性暴力博士」，還頒了一個「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在一興剛珊起來，臉上充滿無奈之情亡恐嚇，就從此收口。」

媒體的聳動報導：狂人惹禍
(圖片來源／吳敏倫)



敏倫的言論驚奇不已，認為他乃異於常人的怪人，不過，他的確具說服力。 (The Daily News, 2004, 11/11)

婦女團體闖和諧之家 聲討「性博士」吳敏倫

媒體的醜化：精神科醫生都是繃線
(圖片來源／吳敏倫)

麼立場，但仍是對你有害。譬如，一些記者與我做專訪，本來主題嚴肅，內容亦無什麼大爭議之處，但刊出來的標題卻把我醜化或用來開玩笑。例如，訪問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特別，問些「你現在退休作些什麼呀」，但刊出來總是有很大的、令人眼睛一亮的標題，是「性學家之死」。

我才退休，怎麼就說我死了呢？其他誇大的標題，還有「狂人惹禍：」、「精神科醫生都是繃線（神經病）的嗎？」等等。此外，報刊上的一些漫畫只要與性扯上一點點關係，也喜歡借用我的名字或形象來代表或增強效果，例如在漫畫裡畫一張A片海報，也加上一個「吾（吳）不倫顧問」，那就是我啦，雖無惡意，但無形中影響了我的形象，讓人家以為性教育就是三級片，也把我僵化定型，幫了反對我的人士一把。

傳媒的力量這樣大，反性人士當然不會忽視利用這個重要的政治基地。香港宗教團體很有錢，權力很大，能出版自己的報刊，免費派發，在教會內外替他們的性觀念宣傳。其中理念、邏輯、事實、證據就算如何不濟也不怕，因為反正是一言堂，外人的相反意見他們也不會刊登，就是內部發行的，給他們的教徒看，沒有什麼需要中立的責任，但是教徒看了之後，可以給非教徒看，就擴大了影響力。除了出版各種報刊之外，他們也有印刷精美、外形吸引、標題正面的小冊子書本等，在學校免費發給學生做宣傳。譬如他們近年在學校派發的一本小冊子，就是以「認同、關心同性戀」為名，裡面大肆宣傳同性戀是病、可以和應該接受治療，因此大家要鼓勵、幫助他們去改變，不改變的話，他們會很痛苦的。整本冊子都是反性、反同性戀、反性別變異的訊息。

當社會有某些性議題要決定，比如說關於同性戀非刑事化，或者如何管制色情刊物，香港政府會公開徵求意見。這時候我們一定將我們的意見，正正經經的寫信給政府，表示意見。但是反性宗教團體不是這樣，他們的傳媒銀彈政策可以大派用場，他們可以買好幾份全港最暢銷報紙的整頁廣告，還可以一連買好幾天，刊出聯署聲明，表示強烈反對意見，不必說理，他們團結起信眾，要有多少簽名便有多少，只求人多勢眾，製造主流意見的假象。我們性教育會怎麼可能跟他們教徒的人數比啊？我們向政府投訴，認為不應該看人數，應該數一數機構的數量，一個機構只准收一個意見，比如說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只能有一個意見，性教育也是一個意見

，這樣才公平啊。政府接受投訴意見，但是宗教團體也有他們的辦法，他們就分很多教派，每個教派算一個會，到政府去登記，每個「團體」只有一個成員也好，總之要達到在民主社會以多為勝的目標。成立團會需要錢，但他們有錢，一個月內便可以開幾十個新會，然後以那幾個會的名義把他們的意見放進去，影響政府的決策。這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性政治。

危機政治

強調或製造危機感也是性政治常用的手段。因為關心則亂、病急亂投醫，一般人在相信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多半都會放棄理性或自主權，受人擺佈、求助於「救世主」。這時候性政治的政客們便得其所哉。

很多保守的性教育都集中於談性的危險、可怕的一面，以此來反對一切他們不能接受的性行為。如果誇張不足，他們還會把危機或害處勉強拼湊出來，譬如談同性戀，一

時事正言

「合法性交年齡」的權術

年輕人近來希望香港能將合法性交年齡，有好多成年人反對，且看他們反對的理由合不合理：

(一) 有研究顯示早性交的女性將來甚易受強姦；且不論這些研究有何局限。

風狂乍作，有一想便想十，一全權立法禁止？不要開口或成人自制力比年輕人高，世上多少大悲剧，都是因成人慾望崩潰所致？而該因為是成年人，又幾才更大。

和男子到十二歲便可獲機械結婚，在印度教教者領內，兒童婚嫁已實行了許多世紀直至近代。現代人心理和生理都早熟，合法性交年齡卻提高至十六歲！無他，以前大家庭人多好辦事，現代家庭

調查近六百名18至40歲人士 六成人童年時遭性侵犯

【本報訊】一項由「婦女權益促進會」委託「香港婦女權益促進會」進行的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六十的受訪者，在十八歲以前，曾遭性侵犯。

調查共訪問了六百名十八至四十歲的受訪者，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表示，在十八歲以前，曾遭性侵犯。

調查發現，性侵犯的年齡多在十歲至十五歲之間，其中以十歲至十二歲的年齡段為最高。

此外，調查還發現，有百分之三十的受訪者表示，性侵犯是由於親生父母所為。

兒童性侵犯的行業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1. 家庭成員	141	(23.5%)
2. 親戚朋友	146	(25.2%)
3. 色情刊物	61	(10.2%)
4. 色情電影	5	(0.8%)
5. 個人私處	26	(4.2%)
6. 好友性騷擾	43	(7.2%)
7. 團體	236	(39.2%)
8. 強行奸姦	65	(10.8%)
9. 虛假性騷擾	33	(5.5%)
10. 強姦	141	(23.5%)
11. 色情電話	123	(20.5%)
12. 色情雜誌	2	(0.3%)
13. 網絡性騷擾	113	(18.8%)
14. 性交	23	(3.8%)
15. 其他	10	(1.7%)
總數	1568	(100%)

媒體製造危機感

(圖片來源／吳敏倫)

一定要把它和肛交、愛滋病連在一起。很多醫學報告和同性戀和愛滋病沒必然相關，但是他們總要找尋同性戀與愛滋病相連的最新證據，讓你們覺得同性戀是危險的，一定要反對。例如他們說某地方的科學家有最新發現，人體內HIV最為集中的是腸道而不是血液，因此肛交容易感染等等，然後就說「同性戀很危險，會傳染愛滋病」。但其實，在引號內那兩句，是報導者自己加上去的。

還有，要是談性開放、性教育、或者色情刊物，性保守者就一定要把這些事情與婦女被強姦放在一起。保守團體常常引用統計數字說「世界上每X分鐘便有一名婦女被強姦」。譬如說新聞裡報導過印度官方數字，顯示該國平均每二十九分鐘便有一名女子被強姦，但是保守團體把這個說法放大到全世界，這是很不科學的。每個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強姦率，這種聳人聽聞的數字只會讓人覺得情況很嚴重而有危機感，因此就可以導向去反對開放的性教育。

又當我們討論建議降低合法性交年齡的時候，性保守者就說調查過近六百名十八歲到四十年歲成年人，六成都曾遭童年性侵犯，還有人在三歲時就被性侵犯，而且同時強化對戀童癖的污名，以便製造恐慌和仇恨。他們很多時候都不是用什麼理由，而是製造危機感，鼓勵人們去反對你。

弱者政治

保守派在性管制的立場上是佔盡利益和權力上風的，但是也會假扮或拉攏弱者來鞏固他們的地位。

前面已經說到他們如何挖空心思拉攏婦女和兒童，不過，他們還有一記「絕招」，就是當他們被反對得走投無路時，便自封為被打壓、歧視的少數弱者，再進一步更可以烈士自居，博取他人的同情與支持。二〇〇五年，他們在香港曾提出詭異的「逆向歧視論」，指自己受到反對者（就是我們）「逆向歧視」，得意於一時，後來經過我為文痛斥之後已不敢再提此論，但是扮弱者還是有的。他們說他們自己是被迫害的一群，聲音被我們蓋過了，因為我們太猖狂，令他們的聲音沒人聽，而他們應該有發言的權力，無法發聲，所以他們投訴，說受到逆向歧視，是社會上的弱小族群。

那他們是不是社會裡的一小群呢？香港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人口，加起來還不到一成，數目上確實是少數，但是我們要看清楚，這些反性人口的影響力是透過整個社會出來的。譬如「婚制」，目前差不多整個世界的婚制，包括在香港，都是一夫一妻制，這個制度就是基督／天主教製造出來的，此外，很多關於性的負面論述也都是在近千年來由他們傳播的，所以，性保守分子的性操控權一向已很大。為什麼？因為他們有西方的統治作後台。只要還有一天西方文化仍然統治世界，一夫一妻制及其一切有關的性負面論述便仍會統治世界。所以，這些反性信徒，雖然在香港數目上是少數，但斷不是弱者，而是強者，只不過在辯無可辯時才裝弱者，這是

很奸詐的。

病態化政治

另外，要打壓一件事，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它病態化。例如把同性戀說成是一種病，既然是病，便不應接受為健康社會的一部分，而是要治療、改正。一些獨裁政府便曾經把全部異見份子都當作是精神病者，關進精神病院。所以，在性方面，反對同性戀者仍然死而不僵，繼續堅持同性戀是病，向人介紹治療同性戀。他們在學校發免費的書來宣傳，說現在有人說同性戀不是病，只是一種政治手段，不是真的，同性戀其實是病，是需要治療的。

更有甚者，為了能更全面反性，有人發明「性上癮」這個病，方便用來反對一切他們不能接受的性行為，包括某些性變異、婚外情、多性伴侶、婚前性行為、青少年早戀、性幻想、看色情刊物、自慰……等等。名人要是被發現性關係很複雜，就剛好用來宣傳這個性上癮症。我們精神醫學界是還沒承認這個病，但是對這個病，香港的宣傳很多，亦有機構已成立「性上癮診所」。美國精神科學會與世界衛生組織都正在準備新版本的精神病分類，性上癮病已被拿上桌面討論要加進去，正反意見爭執激烈，最終鹿死誰手，仍是未知之數。

教育政治

利用教育來滲透反性觀念也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對於香港而言，更是如此。

上面已提過宗教團體向學校派發的《關心同性戀》小冊，但在香港，這類滲透早已經年累月，效果昭著，而那是有歷史原因的。香港近至一九九七年之前，曾經有一百多年是英國的殖民地，殖民地政策讓一切屬於宗主國的文化在屬地上都得到特別的支持、方便和權力，以收文化清洗之效。於是香港最好的學校多半都是信奉西方宗教的，以便幫助灌輸它們的保守性觀念，而禮失求諸野，當這些保守性觀念在宗主國內已逐漸失勢的時候，在殖民地內反而更被強化。稚子無知，在這些「名校」內學習，即使不被迫信教，也難免自幼被保守的性觀念長久薰陶，以致沉迷了還自以為時尚、進步、高人一等，長大後就根深柢固，積重難反，造成開放性教育的一大障礙。所以，以現在世界所有華人地區而言，香港的性保守程度是最高的，因為只有香港直接受過西方的殖民統治與荼毒！

現在，香港是脫離了殖民統治，但西方的教育滲透效果可能還需要過一兩代方能完全清除，何況現時的很多高官或有影響力的精英畢竟仍是從那些「名校」出來的，這滲透力便不只涉香港學校。譬如，香港社會福利署是服務整個社會生活的困難者的政府機構，就在今年（二〇一一），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為其在職員工舉辦的一個訓練講座，便邀請了一個以推銷同性戀是病和可以接受「修正治療」出名的精神科醫生兼某基督教「關心同性戀」組織的會長來提供訓練，他教導說「同性戀是可以變的，他們有變的權利」，「我們一定要尊重他們想變的權利

」。香港的同性戀團體得知後，群起投訴和追究，我亦幫助他們寫了一些公開批評的文章。這類事件提醒我們，保守勢力的滲透可以是關起門來秘密進行的，要極小心提防。

曾蔭權是香港現在的特首，他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報紙常刊有他在教堂祈禱的相片。他就是從香港的一個天主教名校出來的，是比我高兩年的校友（是的，我也是天主教學校出來的，但我是「異數」）。他既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就很難想像他會准許我們做什麼開放性教育，能夠容忍我們到現在的地步已很難得了。

金錢政治

宗教反性人士之所以這樣難被打敗，其中一個因素是他們有錢。香港的西方宗教團體，經費不單來自本地教徒的捐獻，政府的方便，還有外地同宗團體的資助，以維持整個教派的全球影響力和生命。那些同宗團體在西方歷史悠久，身家豐厚，出手闊綽，而即使單靠在香港的信徒或支持者也不會太差，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名校」出身的「成功人士」，捐獻也不會少。

相對來看，香港的性學或性教育團體，錢從哪裡來？會員費一定維持不了，肯捐款的人不會捐給你，因為會被人誤會有性問題、想包二奶、色情狂等等。我們申請教研經費，批准和控制的人是誰？無非又是那些「名校」出身的「精英」或「成功人士」，通常是見「性」字便不批，或有剩餘錢才批一點。批了之後，也設置諸多條件，譬如一定要與另外一個他指定的可信

任機構「合作」。上面說的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便是我申請經費時被指定要「合作」的一個機構，後果如何，你們已經見到。

循正常途徑找經費行不通，找商業贊助又如何？二〇〇六年，香港性教育會開始主辦公共性教育活動「香港性文化節」，我們沒有經費，只好接受商業贊助，贊助商包括出產避孕藥、安全套、性器具、情趣用品等廠家。人家出錢支持，我們當然應該給他們宣傳自己的機會，讓他們擺個攤位，在新聞發表上印他們的名稱和商標。但是立即便被批評商業味太重，為廠家宣傳、目的不純正、性質變了、有違教育宗旨等等，有些人甚至投訴我們違背服務理念。批評者似乎認為最純正的教育是不需錢的，與商業是完全脫離的，卻從來沒介意過學校的教科書皆是由商業出版社出版，很多中小學都是由宣傳宗教的教會或經營賭博的香港賽馬會資助而來，並且以該教會或「賽馬會」冠名，例如「賽馬會官立中學」、「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一路德會賽馬會富善綜合服務中心」等等，何以這些機構都不會被人罵與商業結合、不純正？顯然，很多人對性教育與其他教育有雙重標準，而且把出產性健康用品的人看得比開賭業的更壞、更不堪。

所以為了保持中立形象，為了不受任何權貴操縱我們的性教育，香港性教育會盡量不靠外來資金運作，除非資助者在教育內容和方法上不設任何條件。但這樣我們又怎能運作快近三十年而又好像做了不少事呢？沒有其他方法，當彈盡援絕而工作又不能停止的時候，自己掏腰包

就是了。幸而我有一個畫家夫人，十年前，朋友們慫恿她開畫展，她不肯開，朋友們就說，你開畫展，我們就捐錢給吳敏倫做性教育，這樣她才開了一個畫展，為性教育義賣了廿幅油畫，籌得的金錢至今仍未用完。這樣得來的錢，才沒有人敢哼半句。但又有多少性學家有一個會生金蛋的妻子？

法律政治

法律可以是為政治服務的最有效武器。當一切哲學、道德、科學、人情的辯論都勝不過人的時候，只要你有辦法不擇手段把你的意願變成法律，那你已必勝，至少對方要經一番長年累月的折騰，才可以推翻你。因此性的法律就可以是一個社會手段，以促進某些性行為，例如異性戀，一夫一妻，生育等；或者禁止某些其他性行為，如同性戀，性暴力等；還有規範性道德和忍受性，例如色情刊物法例。

現今世界的所謂文明法律，多以西方十七、八世紀的法律為藍本，無論怎樣文明，也脫不出當時西方的宗教觀，於是現時文明國家的幾乎每一條「性」法律，在現代性學觀點上都是反性的。以下是一些主要的現有性法律及其反性的內涵：

<p>法律</p> <p>傳媒色情管制 性交年齡法律 兒童性侵犯法 兒童色情刊物法律 兒童強姦入罪年齡 一夫一妻婚姻法</p> <p>生育法（如一孩法、禁避孕／墮胎法） 性騷擾法</p> <p>獸姦、屍姦、性虐待法 強姦法</p>	
<p>反性內涵</p> <p>性、色情有害 兒童不應有性生活 兒童應該不懂性、沒有同意性交的權利 兒童不能表現性感或性興趣 兒童不懂性，但若強姦他人便要負罪責 成人性生活一生只可以與一個人進行 同性戀沒有性關係的保障 成人對生兒育女沒有自主權 反性的輕鬆化、日常化 建立性的心理貞操觀 反另類性傾向行為 只有男人可用一個方式強姦女人</p>	

很多以上的反性法例，香港都有，有些更是近年才加進來的，如有關兒童色情刊物及兒童強姦的。我們這些比較開放的性學和性教育團體，限於人力物力，在這方面能做的事有限，況且立法院、執法、司法人員亦多是「名校精英」，這防線很難攻破，不是寫幾篇文章便可以，甚麼效果的。

但必須注意，我不是說上面那些法律完全不應存在，只是說它們很多已是年月久遠的老古董，有些則是由現代的性保守政治運動催生、未經詳細考慮便出台的急就章，內裏的性愚昧、自相矛盾和感情用事都無意的強化了反性觀念，不但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反而令問題更惡化，必須重新公開公平地檢討再訂立才對，所以我們一定要努力轉變這些法律。當然這是很難的，因為它們已經植根多年，性保守分子反而可以用這些法律來限制我們的行動。例如，有些人說我們的書露骨，我便有些性教育著作不能放在中央圖書館，有些是放了，卻放在特別的區域，要特別申請才可以進去閱讀，不是公開的書架。但其實，我的書沒什麼圖片，也要被放在特別的部門裡，只因為他們說我的出版都是色情的，又說我常常發怪論。在包二奶辯論時罵我的人，就有幾個是律師，用他們的專業語言和地位來駁斥我。

暴力／恐嚇政治

性政治的最後殺手鐮當然和其他政治一樣，就是赤裸裸的暴力，由恐嚇開始至實際行動。我接受過的暴力恐嚇或真正暴力已多到記不清。郵寄來罵我的信件很多，也有暴力是在公開論壇上的、在診所內的、也有在街上「無緣無故」的。隨便講一些還記得的，有一次遇到幾個憤怒的人遠遠見到我便說「打他！打他」，好幾個人要打我，我只好換路走。有時我在街上店鋪買東西，突然會有人說「不要賣貨給他：他是衰（壞）人！」，然後店家便說「我不賣了」，

真奇怪！還有些人寄信來說，「你不要出沒某某區，我認得你！」「我知道你和你的家人住哪裡！你小心點。」有次有個人在診所大吼一聲「我掐死你！」，便真的撲過來要掐我了，還好打不過我。又有一個人曾經對我說，「你不要亂講話，我帶了槍來！」，隨即取出槍在我面前搖晃，我就說，「你說得對，好好好」，他就算了。香港這樣還算好，在外國真的有些性學家就此給人一槍斃命了。

暴力也不單單針對我，也有針對我太太的。在一般的社交場合，有不太熟的女士問我太太是不是支持我的工作，她簡單的說聲支持，時就立刻挨罵：「你真沒用，連一句反對丈夫的話也不敢說」，還動手戳我太太的額頭。也有人咒詛我太太：「哼！有日你丈夫包二奶你便知道。」有人也恐嚇她，「為保安全，你也最好不要和丈夫出沒某某區、多為自己買些意外、人壽保險」，還有人跟她說，「站起來，做個獨立自主的女人。」她們完全不知道我太太如何獨立自主，總是以為我太太是違背良心來支持我的。有人同情的對我太太說，「我真為你悲哀！」還有人故做理解的對她說，「我知道，你先生救了 you 出越南，你是為了報恩才委屈自己贊成他所說的一切」，這些都令我太太覺得很不舒服。

可幸的是，我們對這些威嚇都能淡然置之，不會動搖我們所信的和要做的，而且香港人畢竟還是比較平和，我們沒有因這些暴力而承受過甚麼真正的大損傷。

結論和感想

幾年前，我接受某反性的宗教團體邀請，參加一個他們組織的辯論會，名為「誰是道德塔利班？」我們拿出各種事實、證據和理由，互相指摘對方才是道德塔利班。他們的理據和辯才不值一哂，弄到我幾乎睡着了，但也提醒了我一件事：

既然做性學的人逃不過要沾上或甚至進入性政治，而性政治無非也是一種權力鬥爭，廣義來說也是一種暴力對決，那麼我們就應該認清我們的工作立場、定位與範圍，以免自己在有意無意間也成為暴力恐怖分子。我不相信在性政治上以暴易暴是有效的，而即使有效也可能並非必要，而即使必要也應不是由我們性學家來做。我更相信教育與和平協商的效力，也相信真理必勝，扭曲、欺騙和蒙蔽真理的人最終還是會因不能適應生存環境的變化而被淘汰。只要看看近二、三百年來，性保守觀念雖然有反彈的時候，但整體走勢仍然是一直向下的，末日已屬無可避免，性學者實在不必急於一時。若果能盡量保持中立、清醒、理智及其獨有的才能，傳承下去，反而更能在這鬥爭中做個雙方都能信任、聆聽、尊重的協調者，促進變革，讓更多有需要的人更快能得到幫助，減少無謂的痛苦和犧牲。

所以，在實際行動上，我對自己和我的性教育學會有如下指引：

1. 我們的工作以教育、研究和健康服務為本。

2. 我們不發起或參與任何社會政治運動如示威、遊行、抗爭等，但可在後面提供理論和知識上的支持。比如說同性戀團體、青少年團體，他們要做性開放運動，我們支持他們，但是我們不會參加他們的運動。因為我們要中立，才比較容易促進兩方的人溝通。我覺得性政治最容易達到一個好的結果就是妥協，沒有哪一方是應該全贏或全輸的。但妥協就是兩個人的互相了解和溝通，必須有一個中立的人去做，我們做學者的便最有條件去做這個角色。沒有我們這些中間人，他們的溝通會很困難。

3. 我們不製造敵人，只在我們最擅長的教育、研究和健康服務上為雙方提供幫助。

4. 我們不應該做烈士，因為我們不是性政治運動裡的主角。保持自己的能力和有用之驅，才是我們的職責。

四十年前，我的性學啟蒙導師告訴我，我選擇的將會是一條孤獨的路。如今，四十年走下來了，我孤獨嗎？在思想、精神上可能是有一點，但無論做甚麼學問，若是認真和持久，又有誰不會有此感覺呢？或許，我們還應該慶幸有此感覺，因為它可能就是你所略有所得的標誌。而當政治滲入你的工作的時候，你應該更不孤獨，因為政治是「眾人之事」，即是一個集體遊戲，你有你的隊友和啦啦隊，也有你的競爭者和對奕者。歸根結底，所謂政治，無非是一種對奕之道。

討論與提問

與會者：我覺得吳敏倫老師講的很多東西都很有趣。我比較有興趣的是老師您說和一些女權分子遭遇時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因為你說這些反性的、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到後來都變成你的粉絲，我覺得還蠻不可思議的。因為在台灣也有一派比較激進的、反性的女性主義者，她們的言論也都是批判女體物化、色情產業等等，可是她們到現在好像也沒有「迷途知返」。所以我想問吳老師，你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跟她們論辯，讓她們變成你的粉絲？我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台灣的脈絡也有另一批的女性主義者在觀看女體和色情材料的方面，和那些反性的女性主義者提出了很多不一樣的看法。我想要請問，在香港的脈絡之下，是否也有不一樣的、女性主義的聲音，或者對於媒體、女體，跟這些反性的女性主義者有不一樣的看法？謝謝。

吳敏倫：第一個問題，不是每個女權分子我都可以改變她，可是我的經驗是，可以改變很多人。為什麼呢？我想她們罵你的時候，你不要和她們對罵，先謙虛的接受，讓她們講。比如那些給我示威、頒獎的女性，如果你不接受她們，可能其他人見到就走了；如果你罵她們不接受她們的頒獎，那麼就沒有機會和她們對話。所以我就說「謝謝，你頒我這個獎，可能有你們的理由，我們可以找個機會坐下來談談，看我有什麼錯誤呀」，這樣謙虛地給她們有機會詳細一點的講她們的想法，你接受之後，她們就會覺得你也不是什麼難纏的人，是可以對話的。其

實我接了這個獎之後，我寫了很大篇的文章登在報紙的整版，不需要錢的，因為我寫的東西很多報紙都很喜歡，他們不需要我給錢就登出來。我將我的想法，為什麼我講這個、為什麼我反對一夫一妻制，為什麼我不苛責包二奶，為什麼我那次為性侵兒童的嫌疑人辯護，推翻小孩的說法，覺得小孩其實是講大話，後來放了這個嫌疑犯。很多人反對我，說我鼓勵人家性侵犯，但是我把我的理由講出來之後，他們後來再寫了一封信罵我，但是罵得比較理性一點了，慢慢我們溝通了，花了很多時間講話。這只是一個例子，很多其他的例子我也是這樣，不製造敵人，他們要我做敵人的時候，我就說我也可能錯，但是你和我溝通，而很多都是溝通之後就接受了。有沒有另外看法的女權分子呢？香港也有的，但是不多，其實很多罵我的女權分子後面也有一些比較開放的看法的，但是她們想不通的是，她們要是開放，就覺得男的一定不願意她們開放，所以也有對我誤解的。她們可能可以接受色情刊物、婦女的性權利，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想法就是認為我是性霸權、性學的霸權，所以我又和她們解釋，解釋之後很多真的變了我的粉絲了。我的方法就是這樣。

阮芳賦（主持人）：我們時間已經到了，下午綜合討論還可以提問，所以我們這場先結束，謝謝大家。